

國際視野叢書②

亞洲冷戰 與日本復興

MICHAEL SCHALLER 著

郭俊鈺 譯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金禾出版社

112
F781
822
S
120
二

703

國際視野叢書 2

亞洲冷戰 與 日本復興

美國 邁可・沙勒著

郭 俊 鈺譯

金禾出版社印行

Copyright © 1985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Schaller, Michael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亞洲冷戰與日本復興

原著 ☐邁可·沙勒 譯者 ☐郭俊銖

發行人 郭俊銖

定價280元

執行編輯 郭譽孚

印行 金禾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號5樓

TEL: (02) 721~0137-9 FAX: (02) 7520319

郵撥: 15550108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074號

電腦排版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優文印刷廠

總經銷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5F之6

TEL: (02) 366-0309 FAX: (02) 366-0310

☐版權所有

ISBN957-8573-00-6

目錄

譯者的話	1
引言	5
第一章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	9
第二章 重建日本（1945～1948）	27
佔領期的改革	39
第三章 東北亞及太平洋（1945～1947）	63
1. 海外防衛戰略	64
2. 隔離日本	68
3. 麥克阿瑟的見解	77
4. 中國陷阱	85
5. 韓國的餘興節目	87
第四章 戰後世界的再檢討	91
第五章 流產的和約	115
第六章 對自由革新的保守反應	125

第七章	確定新路線	141
第八章	區域性經濟統合和東南亞的興起	163
	1. 東南亞的興起	171
	2. 印度尼西亞模式	178
	3. 到東南亞的新手法	181
第九章	和平條約：再試一次	189
第十章	中國革命之後的日本復興前途	205
第十一章	NSC48和對亞洲共產主義重啓辯論	225
第十二章	日本和東南亞的圍堵與復興	245
	1. 傑塞普考察團	254
	2. 安特魯斯／魏斯脫訪問團	257
	3. 格里芬考察團	258
	4. 官僚對整合的抗拒	261
第十三章	越南的承諾	271
第十四章	中國危機的重燃和日本	285
第十五章	在亞洲作戰	315
第十六章	餘論：亞洲的工場	335
附錄		345
原書註釋		347

譯者的話

1945年八月，二次大戰因日本投降而結束。九月二日上午，米蘇里艦上簽訂降書，美國正式佔領日本。雖然名義上是同盟國聯合佔領，我們中華民國也有份，但一切設施，悉由美國獨斷獨行，他國幾無置喙餘地。

在大戰進行中，華盛頓一直是把歐洲戰場，列為第一，注意力集中歐洲。迨德國在1945年五月投降，歐洲戰事結束，美軍移師太平洋，但注意力東移祇三個月，日本投降後外交作戰重心又轉向歐洲。却因史太林在東歐強力擴張，引起了懼共恐共之心。再加幾位駐蘇大使館奉調回國的外交人員，包括大使哈里曼，參事肯南，和戰時曾在駐重慶大使館服務並擔任史迪威將軍秘書，左傾心理甚重的戴維思，成為杜魯門政府外交政策的重要策劃人。他們危言蘇聯的力量和威脅，更使杜魯門天天為歐洲擔憂。他對亞洲事務，本來就知道不多，以麥克阿瑟領導戰勝日本的餘威，就順勢任命他為佔領日本的聯軍最高司令長官，賦以全權，成為日本的獨裁者。

麥克阿瑟自命戰功，看不起這位未經選舉，憑羅斯福猝逝而接任大位的總統，一方面又以其名義為盟軍最高司令長官的地位，似非美國一國所得控制，於是華盛頓的國務院，陸軍部，甚至總統，都不能任意指揮，頗有尾大不掉之勢。使華盛頓的民主黨政府，對麥帥痛心疾首。於是華盛頓與麥克阿瑟之間，鴻溝難越，加上懼蘇（聯）恐共的心理，對佔領政策的推行，彼此意見不協，終為日本政府看透，從中取利。

一個國家，在大戰勝利之後，往往軍人的勢力膨脹，影響政治。民主如美國，也脫不了這個「後遺症」。將軍們經由陸軍部、海軍部，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行政、外交都增加了發言權，更使佔領當局與國務院之間，增多糾葛和衝突。本書根據過去不為人知，最近解密的資料，抽絲剝繭的講出佔領期間的歷史，其最重要也最引人興趣的有下列幾點：

1. 麥克阿瑟的自誇自大和其盡力對抗華盛頓的影響。
2. 軍人對政策的影響。
3. 恢復日本戰前傳統，仍由天皇領導政府，求得表面上統治安定有效。實際上無法執行佔領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
4. 華爾街如何滲入政府影響政治，終於反轉佔領政策，停止賠償；更使政府投入大量美援以恢復日本在亞洲經濟霸權的地位，也就是為日本促成「大東亞共榮圈」。而悍然犧牲亞洲被侵略國家的利益。
5. 韓戰發生促成對日和約並讓日本大發戰爭財的情形。
6. 與我國有直接關係的兩件事。其一，哈里曼和貝爾納斯勸宋子文緩簽中蘇友好條約，似未為宋所接受。其二，韓戰發生前約一個月，蔣介石總統曾致杜魯門密函，表示必要時他可以下野。（此事載於國務院正式記錄，承薛君度教授

查核證實。)

當然，除了以上各點之外，尚有很多與我國有直接間接關係的事實，值得我們再加研究。這也是譯者譯述本書的理由。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受哈佛教授費正清（John Fairbanks）一系人馬的影響極大。對我國政府成見甚深，本書作者亦不例外，所以對國民政府官員之批評，頗失公允。譯者對作者之不當意見，不加刪改，以昭信實，但盼讀者亮察，勿為著者之偏見所蔽，是所至盼。

本書承翻譯界前輩梅寅生先生閱讀部份原稿並提供建議改正錯誤，舍姪譽孚，代為查核資料，修改文字。尤其馬利蘭大學薛君度教授代為查核國務院檔案，在此一併誌謝。

郭俊銖敬識

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廿七日

引 言

1945年十月一日，國務院官員愛默生（J. K. Emmerson）走進他東京新徵用的辦公室，一位三井公司經理級職員還在清理他的辦公桌。行前，這位被迫離去的經理指著壁上一幅描繪大東亞共榮圈的地圖，笑著說道：“我們已經努力過，看你們能用它做些什麼！”愛默生過去一年在中國專責審訊日本俘虜，對這句話感到極大衝擊；他寫道“當時我立刻想到，他提醒了我美國全亞洲外交政策的重擔，深感不安，我們該用這地圖做些什麼？”

1950年春季，美國正在盡力遏止亞洲各地的共產革命，那句話的預言性似乎正在實現。外交家們和肯南（G. F. Kennan）公開宣稱，有必要爲了日本而建立一個“南方帝國”。那年四月，詐僞而保守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和愛默生的繼任者進行商洽不包括蘇聯和中國，却給美國後佔領期軍事基地的對日和約。吉田抱怨：不但左翼批評家，就連他的右翼同僚，也反對他們竟心甘情願，使日本的利益服從美國的冷戰政策。爲撫慰那些批評，吉田預言說：“美國曾爲英國的屬地，但現在却比英國強大，如果日本成

為美國的屬地，最後也會比美國強大。”

吉田這預言是否已經實現固可爭議，但毫無疑問的，美國戰後的對日政策，跟對日本的軸心伙伴德國政策同樣，乃美國戰後外交政策中突出而成為少有一個成功範例。不像它對中國、韓國、越南政策之灰暗的，甚至悲慘的結局。佔領者達成的結果看來是進步、繁榮、和平、民主。更不尋常處，這些成就在一位最受爭議的戰爭英雄麥克阿瑟將軍領導之下完成的。

雖然關於佔領期的記載多數把它描繪成戰後外交獨一旦突出的事蹟，其實日本自災難至復興的奇跡，與冷戰歷史中的種種趨向，脗合者多，牴觸者少。欲了解美國如何處理德日二軸心伙伴，必先檢視1945年以後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橫掃全球的種種危機。美蘇關係的破裂、西歐和日本的經濟崩潰、亞洲各國民族主義的大潮和中國革命，所造成的各種情況，使麥克阿瑟、杜魯門政府，和日本本身都無法預知自己的未來前程。佔領政策的計劃和執行，不論投降前或投降後，始終未能避免外來影響。相反地，對日本未來的憂慮，決定了美國在亞洲若干最受爭議的行動，諸如對中國、韓國，以及越南的干涉。

即使在1945年八月投下原子彈之前，華盛頓早已仔細研究了戰後如何靈巧地操縱中國、東南亞和日本的願望以控制亞洲。可是淹蓋這全部區域的革命性民族主義狂潮，超越了原來的一切預測，迫使杜魯門政府另謀新的策略。他決定在中國週邊執行一個圍堵計劃，從北海道到巴基斯坦，建立一個反共國家防衛圈，而以重建的日本作為這美國官員稱之為“大新月”的樞軸。這一條防線，一般說來，祇是一連串海外的島嶼據點，却實際上包含著一群經濟上、地理上、政治上和軍事上錯綜複雜，相互關連的網羅。不祇如此，自1947年中期至韓戰爆發，杜魯門的謀士們多數

認為麥帥領導下的盟軍總部對日本的復興和安全害多於利；而麥帥因個人的企圖和政治野心，使他與日俱增的與華盛頓文武領袖對日本前途的觀點急劇地疏遠。

杜魯門在1947-8年決定仿照馬歇爾計劃設計的日本復興計劃，導致這位光芒萬丈的盟軍總部最高司令官跟華盛頓的各部機構幾乎全部都產生了正面的衝突。國務院和國防部爲了反抗麥帥而終止了盟總爲復興經濟、安定政局的若干基本改革。這促進經濟復興也刺激了與日俱增的憂慮，尤其在中國的革命、東南亞的叛亂、和東京缺乏美元的痼疾之下：日本向何處找到它適宜的市場和原料。美國政府，未經先行考慮其全盤後果，便制定一個亞洲計劃，反映日本的意願將其建立爲這個新區域聯盟的工業中心。

本書不圖討論日本內部在佔領期中驚人的轉變，這大部份該是另一個同等重要的故事。作者祇想試圖把聯軍的佔領放在1945-1950年間美國全盤東亞外交政策的脈絡中，揭示這個成功的美國政策的中心和若干有疑問的“保障大新月安全”的鬥爭之間，久不爲人知的關係。簡言之，本書對亞洲冷戰的起源，提供一個新的看法。

第 1 章

太平洋戰爭的結束

對日本的太平洋戰爭接近激烈的頂點時，無人能準確預料佔領日本後的實際情況。美國公眾對偷襲珍珠港和它的結果記憶猶新，加以傳統的反亞洲偏見之下，似乎決心毀滅日本。1944年一次蓋洛普民意測驗竟有百分之十三的民眾贊成殺盡全部日本人。在1945年六月的測驗中有三分之一受調查人主張處死昭和天皇，其餘的多數要把他列為戰犯。參議員希爾（Lister Hill，阿拉巴馬州民主黨）主張燒掉日本的心臟地帶。參議員麥法蘭（Ernest McFarlan，亞利桑那州民主黨）堅持“日本該拿血和都市的灰燼以支付攻擊美國的代價”。而參議員比爾波（Theodore G. Bilbo，密西西比州民主黨），一個可厭的種族主義者，則在日本投降後不久，寫信給麥克阿瑟主張把全體日本人執行絕育手術。

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三部聯席會議的一位顧問建議“消滅近乎全部日本種族，”日本該被轟炸至“不再留下文明”。1945年依里奧脫羅斯福（Elliot Roosevelt，羅斯福總統的兒子）告訴華萊士副總統（Henry A. Wallace，當時商務部長）美國應不斷

的轟炸日本至祇剩一半人口。就是羅斯福總統也一度對把日本人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土人混血表示興趣，他告訴史密森學院（Smithsonian）的人類學家霍立加（Arles Hrdlicka）強制的優生手術也許可以除去日本人種的原始頭腦和野蠻天性。①

有些高級軍事領袖也把這種侮蔑敵人的心情作為戰略的一部份。例如，1945年七月，空軍總司令阿諾德（Henry Hays Arnold）起草了一封信準備空投日本。這信以“親愛的昭和”開始，威脅“完全消滅日本人口，”除非東京立即投降。祇因陸軍部長史汀生（Stimson）和副國務卿格魯（Joseph C. Grew，前駐日大使）竭力反對，才把威脅減輕。②

戰時的暴力和殘忍使任何斥責之辭顯得不夠力量。連續幾個月的大規模燒夷彈轟炸把日本一半的大城市化為灰燼，聯軍打沈商船的行動緊密地封鎖了糧食和原料從亞洲和太平洋輸入日本。幾百萬的軍隊和平民毫無希望地被隔離在中國和東南亞。像硫磺島和琉球這種號稱不能撼動的基地陷入美軍手中時，好幾萬沮喪的日軍被殺或自殺。到八月為止，二百萬日本人喪命，其中四分之一為平民。

待兩次原子彈爆炸和蘇聯參戰之後，日皇自動承認戰敗，八月十五日對民眾廣播，他說：敵人使用一種“新的最殘忍的炸彈”，對“無辜生命”造成驚人的傷亡，戰事如再延長，則不僅將消滅日本，勢將威脅摧毀全部“人類文明”，他引用佛教教義，宣佈日本將“負擔不能負擔的，忍受不能忍受的”以為和平鋪路。

許多日本人早已準備戰敗了，他們心中憂慮的，不是被佔領的必然，而是被佔領之後的情況。一位商業領袖，後來成為外務大臣的藤山愛知郎回憶道：“他們聽說佔領日本的將僅是美國……很多工業家開香檳慶祝一個新的工業時代的開始。”③

投降之前的幾個月，華盛頓和東京的若干當權者已開始研究戰後大勢。不管兩邊發生的狂言妄語，他們試圖描繪一幅能適合美國和日本意願的亞洲太平洋新秩序。據史學家秋良入谷（Akira Iriye）和杜佛（John W. Dover）的深入研究，從極不同的觀點出發，都揭露在1943年已有不少日本官員認為再戰無益，而希望能談判一個有條件的投降。這些中高級的官員認為日本應謀再度與美國合作，回到1931年以前威爾遜主義以非武力方式發展亞洲經濟。

秋良列舉散處政府各部的日本威爾遜主義者，他們立志糾正因經濟衰退和好戰的民族主義者奪得政權把日本引入戰爭路線的悲慘罪過，這批人深信日本應發起和平談判並驅逐政府內極端份子。這步驟可能引出美國友情，而加速日本重新進入世界先進工業社會的行列。④

杜佛研究外交家吉田茂首相，研究這位傳統的保守派（美國官方稱之為穩健派或自由派）對於制定戰後秩序的重要作為。他闡明主和派集團的活動（吉田茂為主和集團的一份子），作為1941年之後保守派的先鋒；這集團的參加者有貴族、軍人、商人和官吏，他們都認識這戰爭為必敗的大錯，可能導致戰後革命。

這些保守人士厭惡戰時經濟管制，和軍人擴大權力，以新的計劃經濟破壞了舊秩序。他們也怕繼續作戰會引出自下而起的平民革命將傾覆舊體系。要避免內部革命或外來破壞，唯有談判和平一途。

這主和集團小心翼翼的在政府和軍人間吸收同志，1945年轟炸轉強時其名義上的領袖近衛文磨以奏章直呈天皇（吉田曾參與草擬奏章一部份）。近衛為貴族，且曾為首相，他明言繼續作戰前途黯淡。二月十四日，近衛面告天皇，戰事前途，唯有戰敗，動

亂，與國體（傳統的天皇政治制度）之破壞。他怪罪東條英機和他的擁護者，為極右人士圖謀仿照蘇俄模式改建日本國體和經濟而引發戰爭，這位貴族在1944年就寫道：“敗戰固可怖，左翼革命會和敗戰同樣的，或更加可怖。”敗戰或終能獲得補救，“如果我們有左翼革命，國體和一切均將隨風而逝。”在他1945年的回憶錄內，他認為聯軍勝利，未必破壞國體，而“隨敗戰而來的共產革命”將消滅一切傳統秩序。⑤

近衛和吉田也以與日俱增的蘇聯威脅警告天皇，蘇聯已經排除德國而成為東歐的權威，如果他們參加了太平洋戰爭，他們會霸佔中國領土，擴大共產主義勢力。近衛也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潛在威脅及若干日本共產主義者和俘虜在延安的活動。

近衛力勸天皇對決意繼續作戰的軍人集團加以制裁，他堅持祇有除去軍閥才能防止內部革命，並促使美國軟化其媾和條件。

“掃除這些軍人勢力圈，改組軍隊”，為“拯救日本，避免共產革命”的先決條件。儘管有此呼籲，可是不論天皇或是主和派都未能對極端的軍人，產生多大衝擊，直至八月間的最高危機事件，〔譯者按：指原子彈爆炸。〕天皇才敢於提出投降建議，軍閥們才沮喪至極而同意。⑥

和平份子的開始失敗，使吉田茂於四月十五日被政治警察逮捕，入獄兩個月。造成了一個意外却十分重要的結果。兩個月的牢獄之災給了吉田一份清白證書使盟軍總部認他是反軍閥的和平人士，而成為盟總可以接受的政治人物。況且近衛的備忘錄揭露這位有影響力的日本人和那些為日本設計戰後路線的美國人士所倡議的政治見解很多相同處。

早在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務院一個非正式的“特別研究組”就曾討論戰後處理的形式。區域專家如鮑頓（Hugh Borton）、費